

Wu
gang
wen
Shi

第六辑

舞钢市
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舞钢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舞钢市文史资料

(第六辑)

(内部刊物)

政协河南省舞钢市委
学习文史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

2075/11

舞 钢 市 文 史 资 料

顾 问 姚世明 杜乔祥 聂登城
 张聚贤 郭学昌 王文华
 司自修

审 稿 王文华 杨稼生

编 辑 平秀琳 李 赛

政协舞钢市学习文史委员会

主 任 邹东昭

副主任 黄培义 平秀琳 刘五洲
 管焕洲

委 员 朱留记 吴庆安
 董汉生 曲立新

目 录

前蜀王王建与妃子花蕊夫人·····	平秀琳 (1)
王建墓·····	平秀琳 (3)
延安生活纪实·····	梁 毅 (5)
大革命前后舞阳的农民运动·····	吴桂林 (25)
忆进军中原令·····	尹国耀 (31)
舞阳解放初期历史回顾·····	范振江 (34)
摧毁反动统治基础 巩固人民政权	
——回忆舞阳县以八台为重点	
全面开展剿匪反霸运动·····	田全德 (41)
舞阳县的土地改革运动·····	刘志甲 (48)
范先生“大闹”舞阳城·····	范振江 (51)
效信趁与叶舞支队·····	平秀琳整理 (53)
“这样的军队，自古罕见”·····	王聘三 (61)
回忆烈士邱政甫队长·····	范振江 (64)
爱国志士陈梦壁·····	陈先吴 (67)
陈融理国内生活点滴·····	刘安庆 (70)
王海仙当尚武镇战备队队长的内幕·····	袁国芳 (72)
烟鬼自述与“查禁烟毒”·····	金光远 (75)
夜袭日寇据点石门郭·····	袁国贤 (78)
石门郭冶铁遗址考·····	袁国贤 (80)
舞钢市的文化遗址与出土文物·····	张文龙 (81)
舞钢第一桥·····	黄培义 (91)

尚店清真寺·····	关守智 (94)
忆解放前尹集小学罢课斗争始末·····	陈耀文 (97)
卢子厚二三事·····	袁国芳 (101)
舞钢市传统节日民俗初识·····	王定翔 (104)
舞钢市十八株古树·····	刘煥峰 王淑兰 (116)
旧社会见闻杂忆·····	钟去兵 (122)
洪洞移民与大槐树考·····	黄培义 (126)
民国十八年八台遭受土匪抢劫大灾难·····	梁修肇 (129)
忆旧中国“水旱蝗汤”四大害·····	梁修肇 (132)
三教九流暗语初探·····	袁典卿 (135)
农谚集锦·····	王耀九 (140)
补 白·····	李 赛

前蜀王王建与妃子花蕊夫人

——平秀琳

王建（847——918），字光图，许州舞阳人，是中国五代十国时候前蜀国的皇帝。王建青少年时，干过磨牛，贩私盐等，后投忠武军为卒，参加镇压农民起义，迁升为列校都头。881年，一部分忠武军卒与邓州、蔡州兵合并，编为八都，都将千人，王建是八都都头之一。884年，王建等五都头领兵投奔流亡在成都的唐朝僖宗皇帝，僖宗大喜，拜他们为诸卫将军，号“随驾五都”。885年，僖宗返长安，任王建为神策军使。886年，僖宗再次出逃，王建保护僖宗得以脱险。僖宗感其勇，赐给御衣派他遥领壁州刺史。不久，王建遭排挤。掌握实权的宦官易人，出五将，派他出任利州刺史，晋晖集州刺史。887年，王建募兵袭取阆州（即今四川阆中），自称防御使，之后，应四川之召，率精兵西行，拔汉州、德阳、进攻成都、彭州，大掠四川诸川。888年，昭宗即位，以王建为节度使，参加讨伐四川节度使陈敬瑄，是年12月，他为行营诸军都指挥

使。891年，王建进入成都，自称西川留后。接着，朝廷任命王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四川节度使。897年，王建兼并东川。902年，又夺取山西南道。903年，唐朝加封王建守司徒，封为蜀王。后又攻占夔、忠、万、施四州。907年，朱金忠代唐，建立后梁政权。王建也接着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

王建注重收揽人才，劝课农桑，为西蜀的安定富裕和文化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918年6月，王建卒，年七十二，葬永陵。传子王衍。925年为后唐所灭。前蜀两代共历三十五年。

花蕊夫人（约883——926年）为蜀王王建之妃，姓徐，人称小徐妃，又号花蕊夫人。生后主王衍，封顺圣太后。她结交佞臣，专权受贿，后为唐庄宗所杀。她所作的宫词，多写前蜀宣华宫游乐故事，世称《花蕊夫人宫词》，其中约九十余首确定为她所作。

本文参考资料

1、王建墓简介

2、永陵石刻通俗讲稿

见《成都市王建墓文物保管所》

王建墓

平秀琳

王建墓冢封土为圆形，直径80余米，高15米。墓室由十四道红砂石券构成，分前、中、后三室。每室之间有木门间隔。全长23.4米。墓前室相当于羨道，券额上还遗留有部分彩画。中室为主室，由七道石券构成，是放置棺槨的地方。棺床为须弥座式，两侧列置十二力士半身透雕像，作抬扶棺床状。棺床东、西、南三面刻浮雕乐伎二十四人，是一套完整的宫廷乐队。乐伎四周及棺床北面均饰以龙、凤、云纹、花卉等图案。后室的后半部为御床，上置王建石雕坐像，南面刻龙、狮形兽及云纹。这些石刻的雕塑品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墓内出土的文物还有：玉大带、哀册、谥册、谥宝、各种银器及铁猪、铁牛等。这一切都是研究唐五代建筑、音乐、舞蹈、服饰的珍贵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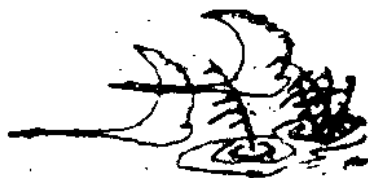
料。

王建墓原称永陵，在四川成都老西门外偏南约一里许。相传此地曾是汉朝司马相如抚琴的地方，后人谓之“抚琴台”。1940年秋，原天成铁路局在“抚琴台”挖防空洞，在西北隅开洞，为砖墙所阻。1942年9月，前省博物馆开始发掘，清理淤土，发现有玉册，乃确知为前蜀永陵。至11月，第一阶段发掘工作结束。到1943年3月，又开始了第二阶段发掘工作。到9月，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墓室经盗掘后，极为零乱。棺槨木质已朽，仅存金属零件，所有出土文物，运往前省博物馆整理。解放后，国家多次修葺。1961年3月，国家规定王建墓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成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1979年元月，整理开放。现存重点文物是石刻。

附：图1、王建坐像

图2、王建墓大门

（图见封面背）



延安生活纪实

梁 毅

一、奔 赴 延 安

1940年9月间，舞阳县的政治形势更加恶化。地下党决定我和陈经伦，董耀礼等同志去延安学习。当时我正在河南省内乡县西峡口学习收发电报，接到李经伦的急电就匆匆赶回舞阳县城，见面后，商量的走的时间和集合地点。去延安要严守秘密，所以王树文、李振华等同志来看我，虽然我们都很好的朋友，又是革命同志，但已不在一起过组织生活了，我们谈了很久，但始终没有告诉他们去延安的事，只说是去重庆考大学的。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说的。我父亲和大哥到处借钱，给我做路费，老母亲和姐姐也忙着给我缝被褥、做衣裤准备行装。我还到八台街联保处开了一张去重庆的路条，以防国民党的关卡检查。

出发那天早上，天不明就辞别了双亲和全家，由邻居魏书彦帮助带着行李，到城西二十多里处的约定地点等候。我们见面后就相随上了路。由于日本飞机狂轰乱炸，火车、汽车都不通了，我们只得徒步行军。当天夜里我们住在叶县城关的一个小旅店里。步行一天大家实在太累了，随便吃点东西就睡下了。第二天又继续赶路。一路上既要防日机空袭，又要应付国民党哨所的盘问。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总算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过了两天，苗宝太、李在藻和他的弟弟李在寅等同志也赶到了。在办事处还看到了张秀松、董瑶、刘先梅等同志，他们都是先到的。我们住下后，通过政市，将待命去延安。据办事处的同志说，国民党三清团的特务，经常在办事处附近窥探，一有机会就向我们寻衅捣乱。前几天我们有几个同志在大门外球场打篮球，他们硬要参加，不一会就故意和我们的同志打起架来，宪兵很快跑来把打架的都抓走了，我们的同志至今下落不明。这之后，除办事处工作人员以外，都不准随便出大门。在招待所待命去延安时，有一位办事处的领导同志向我征求意见，想留我在招待所当所长，因我去延安学习心切，我被批准去延安。

出发的前几天，组织上要我当一名八路军的上士班长，奉命护送军人家属去延安。并要求背诵是那个团、那个营、那个连的，以及班、排长的姓名。她们也要背熟自己是哪个团的家属，以防途中万一。其中一部分同志是新四军的家属，皖南事变后撤到延安的。还有一部分同志是从敌占区投奔革命的女学生，如张秀松、刘先梅等同志就是这样。我们就象演剧背台词一样，非常认真，深恐因为自己到时候应付不好，被敌人发现，使革命受到损失。

出发的当天晚上，由办事处的同志带领我们绕小道摸黑先到西安北关，在一间小屋里，大家按小组挤住在一起。屋里没有灯光，什么也看不见。休息了几个小时就乘坐大汽车，在月光下出发了。那时候去延安的路，说是公路，不是爬坡，就是钻山沟，路窄弯多，崎岖不平，汽车颠簸得很厉害，只得缓缓前进。有时汽车走在山坡上，下面就是几丈深的山沟，稍有不慎，就有翻车的危险。好在司机同志技术高，经验丰富，一切险情，都化险为夷。尽管如此，我们坐车的人一路上都捏着一把汗。车行了十几个小时，停下小休息，大家简单吃点东西后，又继续前进。

汽车走到洛川县城外时，被一群三青团员拦住，说：“前面山里有土匪，过不去，先住下等路上平静时再走吧”。说的倒好听，可我们知道，他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在西安办事处的领导同志就讲过，这些国民党的走卒，民族的败类，专门在这条路上拦截我们去延安的革命同志。听说以前就有几批去延安的革命青年被他们拦住，晚上用威逼、引诱等手段拆散他们后，一部分送到西安战士团，或青年团去，迫使他们去干那种投降卖国的反革命勾当。办事处的随车副官和他们再三交涉就是不让我们走，眼看天快黑了，大家都很着急。正在这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乘小汽车从西安回来，问明了情况，就训斥了他们一顿。因为林老曾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这些小特务都很怕他，所以他们不敢再纠缠，只得灰溜溜地逃跑了。我们度过了这个难关，急忙登车，披着夜幕赶路。

到达交道口（富县）时，将近半夜。听说已到边区了，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住进一个小店里，这时又累又饿。看

们的老同志说，锅里还有一只煮熟的羊，你们对付着吃吧。我们吃完，刚睡下，天就大亮了。随车的副官说：“到边区了，汽车不再送大家了。”于是用牲口驮着行李，我们就徒步行军向延安进发。说也奇怪，边区人态度好，有礼貌，边区的天好象也格外晴朗，温暖如春。

一路行军，虽然很累，可是大家有说有笑，精神欢快。有几个女同志，边走边唱着革命歌曲。到延安时已是日落黄昏了。我们兴奋地高呼：“到家了，到家了！”一眼望去，只见一幢幢高楼，一排排灯光。当晚我们住在中央招待所。第二天早上出去一看，哪有什么大楼、电灯，全是整整齐齐的窑洞，那灯光就是窑洞里点的小煤油灯。我们不禁大笑起来。

李经伦和李在藻等同志是化装绕山道从西安出发的。我们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他们才赶到。经过填表、审查、写自传和中央组织部同志的几次面谈后，我和李在寅、张秀松便分配到了青年干部学校。从此，开始了我们紧张的学习生活。

二、学 习 生 活

我们的校址在文化沟。住的是窑洞，一天三顿小米饭，菜很少吃。生活虽艰苦，但我们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们还到延安城里背过几次旧砖，供中央党校修大礼堂用。到那里一看，这哪是延安府，简直是一片废墟。日本飞机把这里轰炸成这样，真令人痛恨！

校长冯文彬同志经常给我们作时事报告，中央首长博古

同志，中央党校的张天民和中央青联的黄华等同志，都给我们上过课。在窑洞前的小平台上放一块黑板，就是课堂。老师在黑板上写着讲着，我们坐在小马扎（木凳）上边听边抄写，课本、讲义什么也没有。记得博古同志讲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张天民同志讲的是“党建”，黄华同志讲的是“青年运动”等课程。每堂课大家精神都很紧张，紧赶慢赶，还是记不完，晚上自学、复习讨论时，再把缺少的部分补记上。

1941年2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全校召开支部委员以上的党员干部大会，在总结工作以后，校领导作时事报告。当讲到国民党又发动了反共高潮，西安胡宗南的军队向边区大举进犯时，大家都非常愤怒，齐声高呼：“反对内战！反对胡宗南进犯边区！”接着一个同志竟大声喊道：“打到西安去吃大饼！”还有好几个同志也跟着喊起来。可见大家由于吃小米太久了、对面食的兴趣有多大。

春耕开始了，同学们每人扛一把镢头在山上开荒，你争我赶，热火朝天。女同学在前面挖地，男同学在后紧追，并大声喊：“追呀！追呀！加油干呀！”虽然累得满头大汗，可是大家都非常愉快。

学校很重视文化娱乐活动。我是班俱乐部主任，经常组织大家读报纸，写墙报等。还经常看《列宁在一九一八》等影片。星期六晚上，有时也去文化宫看跳“交谊舞”，他（她）们都没有西装和皮鞋，当时叫“草鞋舞”。有时礼拜天我们还到文化宫听肖三同志作报告。他是从苏联回来的，他讲的都是苏联红军在列宁、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英勇战斗的故事和苏联人民革命胜利后的幸福生活情景，大家都很爱

听。

4月，中央在安塞筹备成立机械工程学院，组织上调我和丁立、袁新等同志去学习航空工程。校址在安塞的深山里。校长王弼、教育长常乾坤和教员刘风、王连等同志都是从苏联回来的。听说他们有的对航空很有研究，有的有飞行专长，有的会说一口十分流利的俄国语。当时，这所学校曾有“红色航空学校”之称。有这样的学习条件，大家的热情更高了。同学们在修建校舍和上山砍柴、种菜、浇水等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干得很卖劲。动员会上，有位老师说：“你们要努力学习俄语和航空理论，将来到莫斯科去学飞行和航空工程，当一名新中国的飞行员或航空工程师。”这些话对我们鼓舞很大，已深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从此我们对俄语、数、理、化等的学习就更努力了。

除了学习，我们还要打窑洞。从安塞到杨家岭五十多里山路，天不亮就起身，走到延安正好吃午饭。下午我们在杨家岭北面的山坡上选好地形就动手干起来了。干这种活，外行还真不行。刚开始挖个小洞，人进去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有力使不上。我和盛卡夫都是学生出身，又是外行，更是累得要死，两个一班换下来时，满身是汗，腰疼腿酸，躺在山坡上就懒得一动也不想动，夏云超和潘明珍两同志身强力壮，又很内行，也不象我们那样累。以后我们也学着他们那样干，慢慢的就好多了。直到挖好窑洞，完成任务，我们又回到安塞学习。

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不可能再派教师来上课。中央决定工程学校停办，全体师生调到延安抗大，合并办校。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原名红军大

学，创立于陕北瓦窑堡，1937年初改名为抗大，校址迁至延安。为使学校教育更适应前线的需要，在战斗环境中更好地培养锻炼干部，中央决定，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办校。并在其他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建立了十二个分校。抗大三分校留在延安继续办校。

在抗大校门的墙上，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这就是抗大的四大校风。毛主席给抗大规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大教育方针，全校学员和干部都记得牢牢的。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对抗大都非常关心。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经常亲自来上课，或作报告。抗大的基本教材，也都是毛主席的重要著作。如“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

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抗大始终把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放在首位。从1936年到1945年的9年间，共培养了十几万名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都称抗大为革命熔炉，这话一点也不错。

我们工程队为了便于学习航空工程，需要先学俄文，就把我们编入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第三队学习，常乾坤同志任大队长，李觉民同志任政治协理员，王弼同志任教学方面的领导职务。队长是陶铁英，后由刘凤同志继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延安抗大三分校要培养特种兵指挥员和各种专业领导干部，不再培养步兵指挥员。因此除俄文队以外，又成立了炮兵队，工程队，参谋训练队等。

1941年12月，中央决定抗大三分校改名为延安军事学院，由朱德总司令兼院长，叶剑英总参谋长兼副院长，郭化若同志任教育长，黄志勇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吃水要从山下去挑。晴天还好些，一遇下雨或冰雪天，就困难了。我们吃的粮食，烧的煤炭都是到几十里以外的粮库和煤窑上去背的。没有粮袋就用绳子扎住两个裤角装粮用。

我们的伙食是单调的。因没有副食，每人一天一斤七两小米，煮粥吃还可以，吃干饭就不够了。有时领到小麦时，也不能磨面吃馒头，只能磨碎带皮煮面糊糊吃。就这样，吃了一碗，再盛第二碗就没有了。菜也少得可怜，油更少，一碗南瓜汤上面漂着几个油花，有时就看不见油花。小米锅巴又香又脆，我们都爱吃这种“列宁饼干”。

只有到过年过节时，我们才能吃到足够的大米白面、大肉、饺子和多样新鲜蔬菜。

我们的学习条件非常差，同学们用边区生产的马兰纸作本子，自制墨水，记笔记。条件再艰苦，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的学习目的是明确的。谁都知道，党派我们来学习，任重而道远，时间比金子还宝贵啊，所以我们从不逛市场或在家打扑克，争分夺秒集中精力搞学习。为的是提高军事、理论水平，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可今天有些学生，在吃喝玩乐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实在可惜！

1943年3月，中央决定军事学院搬到绥德去，和从前方回来的抗大总校合并办校。我们得知后都很高兴。可是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院教育长郭化若同志找我和其他队的几个同志谈话，调我们到军委政治部去。我们到了总政组织部，